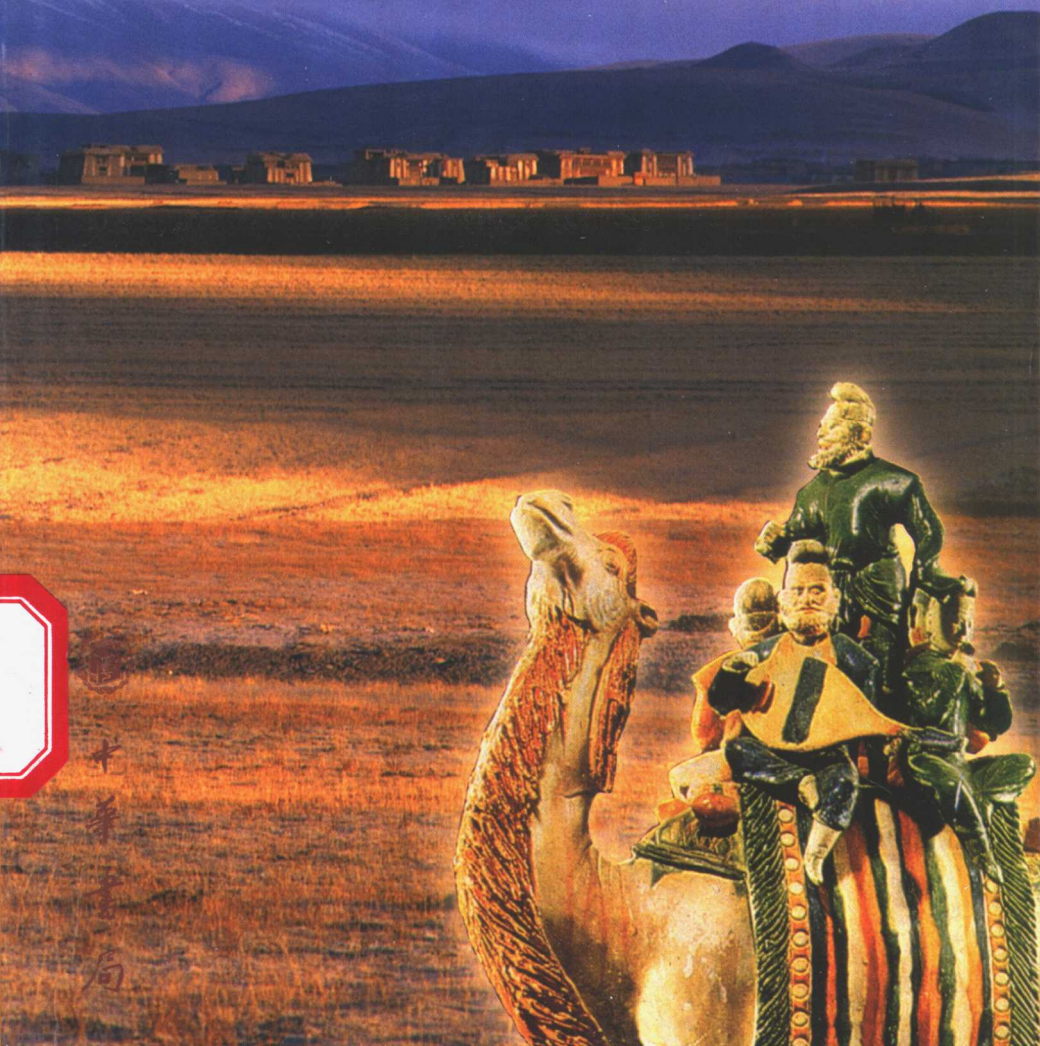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多桑蒙古史 上册

[瑞典] 多桑 著 冯承钧 译



中华书局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多桑蒙古史

上册

[瑞典]多桑著

冯承钧译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桑蒙古史/[瑞典]多桑著;冯承钧译.-北京:中华书局,2004
(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)

ISBN 7-101-03702-X

I.多… II.①多…②冯… III.蒙古族-民族历史-研究-中国-古代 IV.K28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9511 号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多桑蒙古史

(全二册)

[瑞典]多桑著

冯承钧译

*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33¹/₂ 印张·742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册 定价:68.00 元

ISBN 7-101-03702-X/K·1561

前 言

多桑(C. d' Ohsson)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,1780 年生于君士坦丁堡,历任瑞典的外交官,1855 年死在柏林。他精通突厥、阿剌伯、波斯及西方诸国的语文。这部《蒙古史》是用法文撰写的。著者凭借他的丰富的语文的知识,参用了大量的阿剌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,对蒙古民族在中亚、西亚以及欧洲的活动史实作出了详细的叙述。全书出版(第一册 1824 年初版,全书四册 1852 年出齐再版)以后,欧西各国盛行一时,获得了历史学界很高的评价,并为中西学者所广泛使用。

关于中国蒙古王朝——元代——的历史,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文献史籍。《黑鞑事略》、《蒙鞑备录》、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圣武亲征录》等书和明代官修的《元史》,都是研究蒙古史的头等史料,其中《元史》更是记载蒙古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的最详尽的巨著。这些史料早已为中西学者所重视。但是,十三四世纪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有着世界性的意义,他们不仅统一了全中国,并且还远远地向西方发展,达到东欧各地,建立了察合台、钦察、伊儿三大汗国,给予这些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以极大的影响。因此,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我国元代和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,西方文献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。多桑的这部书以及这部书中所引用的著作,如刺失德、朮外尼和瓦撒夫的书,都是值得参考的资料。

这里应该指出,多桑的《蒙古史》是有局限性的,除了译者在

序言内指出的史料编纂方面的错误和疏漏之外,它只是比较有系统地叙述了一些历史事实,而对于这些历史事实却没有也不可能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判。但多桑这部书,正如冯承钧先生在序文中所说的,在刺失德的《史集》以及其他波斯、阿剌伯文的许多著作没有译出以前,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有用的史料。今天我们重印这部书的原因也就在此。

多桑的书卷帙颇巨,出版百馀年来,全部译成东方文字的只有冯承钧先生的汉译本。日本田中萃一郎的日译本,仅完成了前三编。冯先生翻译此书,因为上下两册分期译完,有些译名未能统一,他生前提起,每引为憾事。中华书局要求将先生的译本整理重印,为了便利读者,我就本着先生生前的愿望,除了将两册的译名尽量力求一致以外,并在后面增添了译名对照等表。在今天中亚史料未能大量译出之前,我想对于研究蒙古历史的人,这部书会有-定的帮助。

陆峻岭

1958年9月于北京

译 序(一)^①

一部《元史》，历来囿于“正史”成见的人皆说不好，所以陆续改编了些《续编》、《类编》、《新编》、《译文证补》、《蒙兀儿史记》、《新元史》。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，其实不然。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，而修《元史》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；不解外国语言，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，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。更有进者，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，《译文证补》就犯这种毛病。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“西域书目”，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“笔受”的。不仅未见波斯语阿剌伯语种种撰述，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(Howorte)书转录的。洪氏证补《元史》之功固不可没，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，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，不及汉字译音之备，此说很不可解。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，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，未免很奇。他在《译文证补》里面，根据译人的口述，改了许多《元史》固有的地名人名，比方《元史》译 Heri 作也里，《元朝秘史》作亦鲁，皆有译例可寻，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 Herat 译作海拉脱，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。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他这种创译，苦了后来续修《元史》的人。所以《新元史》的阿儿浑，在此人本传中作阿儿浑，而在《旭烈兀传》同《西域传》中又作阿儿袞；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。

^① 这原是本书下册的译序。后面的一篇原是上册的译序。

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《蒙古史》翻译出来,此书出版虽已有一百多年,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,仍不能不拿来参考,因为《世界侵略者传》、《史集》、《瓦撒夫书》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,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。案多桑书共有七卷,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,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,并附带言及钦察、察合台两汗国。其第一卷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,译文还忠实,可是有许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。第二、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,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,所本的汉籍,以《续通鉴纲目》、《元史类编》两书为最多,偶亦采用《元史》。然而于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圣武亲征录》等书皆未引用,当然说不上《黑鞑事略》、《蒙鞑备录》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、行状、家传了。所以我译此书,先从后四卷译起,将来如有馀暇,再译比较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。

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,也有人名地名不统一的毛病,尤其使人讨厌的,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,然而也无可如何,不使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。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简单,可以取来对照。

我原想用白话翻译,不用“史书文体”,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,然而我始终力避用“典”。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,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,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,不去锻炼字句。在别人看起来,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,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,容或有点削足适履;文义涩滞的地方,容或确可比对原文;所以宁愿拖泥带水,而不愿钩章棘句。

从前编纂《元史》的人,除开屠寄以外,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;所以我在翻译中,对于人名地名,颇为审慎。凡人名地名皆以《元史》、《元秘史》两书为主,两书所有的,选用一名。两书所无的,地

名一项,尽先采用唐、宋、明人的译名;人名一项,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,如帖木儿、不花、阿里、忽都不丁、阿合马、亦思马因、阿老瓦丁、马合谋之类,虽非本人,亦用旧译。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,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,不敢以今人的读音,认作元人的读音。元人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,好像不对,比方将-l 读作-n,就是一个例子。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,从前也有,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,所以译 *sultan* 作算端, *Djelal-ud-din* 作札兰丁, *Ilitchikadaï* 作宴只吉带。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,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,不能不用变例。

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,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。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、h 的字母,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。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,移植到蒙古语中,应读若 *bagatur*,可是在蒙文《元秘史》中写作把阿秃儿,则成 *ba'atur*;在《元史》中更简作“拔都鲁”,则成 *atur*。又一方面,阿剌伯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,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,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,本书竟有写作 *Behadir* 者,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,而将他改作八哈都儿。此变例一。

伊斯兰教人的名称,无所谓姓,加之名字相同,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,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,如用职务官称之类;再不能判别,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,如 *Ibn Ali*,犹言阿里之子之类;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,如报达人,朮外因(就是《译文证补》的志费尼)人之类。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,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,略为变通。如《元史》中的 *Argoun*,是种族名,是军名,亦是人名,《元史》为判别这些名称,将他写作阿儿浑、阿鲁浑、阿里浑、阿剌浑几种写法。我也仿照这个例子,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,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,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(*Tourkan Khatoun*),究竟是二人是三

人,无从知之,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。此变例二。

本卷中有些译名,看起来好像是变例,其实是正例。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의统将名唤 Nogai,《译文证补》将此名译作诺垓,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,与他同名的人,在《元史》中颇不少见。我们姑将《元史》的译例来解说。《元史》(我所指的当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《元史》)定宗后名唤斡兀立海迷失,就是西书的 Ogoul Gaimisch,可见海字对 gai。蒙古人的官号 Noyan,在《元史》中写作那颜、那演、那衍,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 no,对照起来,Nogai 应该译作那海,而不应改作诺垓,这类例子很多,姑举其一,以概其余。

还有些译名,可以说是正例,也可以说是变例。旭烈兀有个儿子,在此书中(第五卷)写作 Councouratai,《译文证补·阿八哈补传》写作空库斡台,《蒙兀儿史记·世系表》作空古斡台,《新元史·旭烈兀传》作空古斡儿,然在《台古塔儿传》又作康廓而拉台,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。案元代的蒙古人,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,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,大概男名加“台”,女名加“真”。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,并不是本部族的人,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,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,马扎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,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,不过取其名而已。此处的 Councouratai 也是此例。多桑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,写法因之有异,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《史集》诸部族名,有 Councarat,就是此人名之所本,也就是《元史》所常写着的弘吉剌,此名在《辍耕录》中作瓮吉剌,在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中作王纪剌、广吉剌,用新式写法,应作 Qongirat 或 Ongirat。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,有时不用声母,我现在还不能答覆这个问题,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,因为辽、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,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-i,所

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弘吉剌台,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,其实我有我的理由。

本书有若干地名,我明知有误,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,只好随他。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剌夷时,有个地名作 Khar,按照霍渥儿特《蒙古史》所引 Quatremère 译本《史集》,此地名是 Khowar,则即是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之胡瓦耳。然而我不敢改正,仍然译作哈儿。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,似乎应该“名从主人”,不应用欧洲语言的名称。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,而应名曰密昔儿(Misr);美索波塔米亚(Mésopotamie)应改作 Djézireh。可是我是译书,而不是在考订,所以也不便改他。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。阿剌伯语名阿母河曰 Djihoun,此河元代本有阿梅、阿母、暗木等译,所以我习用旧称,不用新译。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 Transoxiane,原意犹言“乌浒水外”,译用这个名称,未免太僻;若用康居的名称,未免太古。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,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,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,东兼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之途鲁吉(Turki),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。考此地阿剌伯语之原名作 Maveran Nehr,此言河中,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(见《湛然居士集》及《西游记》)。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中,其地既在西域,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。

译名一贯之重要,取下面所引的一段《新元史》观之,就可知道了。《新元史》卷二五六(12页)云:“西里亚,埃及属国,以他木古斯为都城,埃及与蒙古隔绝不通使命。宪宗初,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,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,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。”案此处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,明明是一个地方,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。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。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

用的名称,固是 Damascus,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 Damas 而译作大马司。《新元史》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,就是多桑书的 Nassir Salah ud-din Youssouf,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刺丁亦速甫。《新元史》的译法,除开“商”字外,尚可勉强对付,可是后面的“基纳斯列母”,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,势须作 Kinasremou,同多桑书的 Jérusalem 未免相去太远了。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,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,不知为何发生这样的讹译,大约是翻译的人太无史地常识,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。由这一方面看起来,可见修《元史》不仅仅要通晓与《元史》有关系的若干语言,而且还要抛弃汉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。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,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《元朝秘史》刊行后,考究元代的读音,再就考究的结果,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。那晓得等待了十四年,除开片段的发表外,全书尚未出版,所以于译此书时,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,将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;然不能遍注,只以初见者为限。有时一名两三注者,或因原名有详有略,或因一名写法两歧,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,所以一再著录。

读者还要注意的,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,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,而且他所本的史料,也不免讹夺。现在姑举一例来说,《史集》记载从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,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 Djodjou,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 Simali,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。可是 Klaproth, Yule, Blochet 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,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,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。现在从燕京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,何至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,足证刺失德(Raschid)书传抄有误。伯希和在《亚洲报》(1927年刊)说是抚州之误,这种考订是不错的。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,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,也要审慎。本卷

中所言的狮符,明明是虎符之误,新修元史的人过於重视西方载籍,常将虎符改作狮符,然则《元史·兵志》“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”的记载,竟成狗矢了。

1933年6月1日冯承钧识

译 序(二)

多桑书共有七卷。我前以为西域三大汗国的史事,在旧籍中颇欠缺,在新编中亦多疏误,故先将后四卷逐译。后来看见田中萃一郎所译的前三卷,我又觉得全书仍有翻译之必要(田中的译文我在《大公报》图书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评),遂又将前三卷转为汉文。翻译时间既有先后,前三卷同后四卷的译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。比方 Mohammed 先译作“漠罕默德”,后在前三卷中概从唐译作“摩诃末”,就是一个例子。全书译竣,我想将后四卷取回整理,不意原稿清样统已制成纸型,势须大加挖改,末后只好听他。前三卷有新式标点,后四卷无,也是因为这种关系^①。

我从前在第四卷序中说过,多桑书同《元史》一样,也有译名不一贯的毛病。因为他所本的伊斯兰教撰述,文字不著韵母,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,常易相混,所以不特相近的韵母有时误用,甚至难于互用的韵母,也能混淆不分。声母之误如果无他书可以对勘,竟至无法考订。比方主儿勤之误作 Bourkines,错了一个声母,那牙勤误作 Boucakines,竟错了两个声母,一个韵母。他最使我感困难的,就是对于 c, k, g, kh, gh 等声母毫无分别,例如他译写的 gan, 对音可作干(gan),又可作坚(gän),且可作罕(ghan, khan)。这种困难有时还可以用前后文去补救,例如 Togan, 不难认识是脱欢。

^① 此次重印,已将前三卷与后四卷译名加以统一,后四卷也改用了新式标点。

可是他有时又将 o 同 ou 两个韵母互用,写作 Tougan,则未免使人犹豫不决,因为蒙古人也有名唤秃坚的。像这一类的困难不计其数,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将他解决。

此外有些译名,好像与对音未合,其实不然。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证过若干变例,比方将-l 读作-n,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, gh 等声的字母,就是两个大变例。此外尚有若干为前序所未及的,条列如下:

突厥语发音之 y,在蒙古语中常变作 j。比方突厥语驿站作 yam,蒙古语改作 jam。突厥语法令作 yasaq,蒙古语则改作札撒黑(jasaq)。讹答刺城的守将,杀成吉思汗使者的那个人,刺失德书名亦纳勒出黑(Yinalčuq),号哈亦儿汗(Qayir-khan),而在《元史》则作哈只儿只兰秃(Qajir-Jinaltuq)。除以蒙古语语尾之-tuq 替代突厥语语尾之-čuq 外,两个 y 皆变作 j,一个 l 变作 n。这种例子举不胜举。

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 b 变作 m,若乞卜察黑(Qibčaq)之变作钦察(Qimcaq),哈卜哈纳思(Qabqanas)之变作憨哈纳思(Qamqanas),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

蒙古语对于发音之 r-,常叠用其后之韵母,比方 Ros 之作斡罗思(Oros),Riazan 之作也烈赞(Äräzan),也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这种译法同古译相反,比方《宋高僧传》卷三有阿儂真那(Ratnaci-na),竟将发音的 R-简单删了,大约是汉语同蒙古语无此发音,所以读音或增或减。

发音之 A-有时省略,比方 Abu Saïd 之作不赛因,Abu Bâkr 之作不别,是见于《元史》的变例。可是也有帖木尔的后人 Abu Saïd 在《明史》中写作卜撒因的。看这个例子,足见收声之-d 偶亦变作-n。但是这种变例的收声不常见。

蒙古语尾之-n 增删无常。若阿勒赤(Alči)亦作按陈(Alčīn),河西转为合失(Qaši),也可变作合申(Qašin),月忽难(Yohunan)又可作月合乃(Yohuna-i),这个月合乃在《元史》卷一三四误作月乃合,诸本《元史》皆然,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实作月合乃,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突厥语转贩而来的,在蒙古语中则变作朮忽难(Juqunan)。

蒙古语常读t作d,比方将tarqan读作答刺罕,将taір读作答亦儿,就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这种读法好像不是蒙古语所独有的,从前汉译tarqan曾作达干,Turküt曾作突厥。

上面所说这些变例,不但是译多桑书所应知道的,就是读《元史》也是应该知道的。至若我所用以译写的汉字,我很想适合当时的读音。因为翻译非汉语的人名,固然要求一贯,可也要注意当时的读法。我曾说过,如要整理《元史》译名,必须备具几种条件:(一)要名从主人;(二)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;(三)要明白汉字的古读,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。从前整理元史的人,好像多未备具这三个条件,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离不明。比较以前的整部成绩,只有那珂通世的《成吉思汗实录》微合第二第三条件,可是他常将《元朝秘史》的译音译写近代西文地名:将契丹改作乞坛(Qitan),还可以说是乞塔惕(Qitat)的单数;将波斯作珀儿昔阿(Persia),也可勉强对付;可是将埃及作额只愧惕(Egypte),而不用名从主人之例,作密昔儿(Misr)等类的译法,未免过于刻舟求剑了。但是比较其他改修的《元史》,总算强多了。在学界种毒最深的,要首数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的译名。洪氏丝毫不问上述的三个条件,同元代译名的那些变例,对于《元史》名称妄加改窜:比方译Catching作哈准,而不用元译的合赤温或哈赤温;译Noqai作诺垓,而不用《元史》屡见不鲜的那海或那怀,自以为新,其实错了。古人

翻译,很明了汉字的读音,比方《圣武亲征录》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将,译名作三木合拔都,后又作三合拔都,此人的原名是 Samuqa Ba'atur,翻译的人用“三”(古读 sam,今粤人尚作此古读),照顾到第二个字的发声。这种译法就是从前佛经的译法,也就是《元朝秘史》的译法,不像今人随使用本人乡土的方言,同似识非识的汉字,译写外国语言名词之乱。所以《元史》中的译名虽不统一,除开过于省译之名称外,皆不难复其原名。至若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一直到《新元史》的译名,能够还原的恐怕很少。

我所用的标准译字,多从《元朝秘史》,然而并不认定《元朝秘史》是一部完全不误的译文,其中也有些传写的错误。比方将你沙不儿(Nisabur)写作亦薛不儿(Isäbur),将亦剌合(Ilqa, Ilaqa)写作你勒合(Nilqa),可以说是音点不明,致有此误。可是杀乃蛮王子古出鲁克(屈出律)的地方作撒里黑昆(Sariq - qun),证以近来发现的蒙文《秘史》残本,实是撒里黑豁勒(Sariq - göl)之误。如此改正方与蒲犁县之土名相合。这类版本的错误,《秘史》中尚有不少,所以我虽采用此书,可不绝对盲从。

旧译名除开过于省译的名称,像忽亦勒答儿(Quildar)《元史》作畏答儿的例子外,我皆尽量采用,决不自出心裁,妄易新翻。元代载籍所无之人名地名,而有旧译者,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,如隋唐之范延,《明史》之帖必力思之类,亦不别用新名,不用今读之字译古名,也不用古读之字译今名。凡原名初见者,皆附西文原名于下。可是对于多桑书所采乾隆时妄改的名称,根本既有错误,西文译写之名除不误者外,概从删弃。好在多桑书的精华全在伊斯兰教著作,他所转贩的那些汉籍副料(以《续通鉴纲目》为最多),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。

多桑书所引刺失德书很多,而刺失德书同《圣武亲征录》并出

一源。在刺失德书未直接转为汉语以前,我觉得多桑书是一部很好的参考史料。比方《亲征录》所载木华黎率王孤、火朱勒、忙兀、弘吉刺、亦乞刺五部,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国一文,其中的火朱勒部,久之未详其对音为何,今观多桑书,知为 Qošiql。然则《亲征录》原译或是火失火勒矣。刺失德书(Berezin 本数见此名)说是每十人队中挑选二人组织成的军队,此说颇类真相,因为此字的字根是 qos,突厥语犹言双也。此姑就以多桑书校正中国史录而言。反一方面说,也可取中国史料校正多桑书。兹举一例为证:多桑书第一卷第二章有个部落,名称曰亦勒秃儿斤(Ilturkine),后在附录中亚部族表中,又作亦勒都儿斤(Ildurkine),检《元朝秘史》卷六相对之文(叶本 31 页),王罕有个使臣名亦都儿坚(Idurgän),后(49 页)同一人又作亦秃儿坚(Iturgän),也是一名两种写法,姑不问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,要可以《元朝秘史》的名称改正多桑书之误。

我译多桑书时,很想作一种互证的工作,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,可是费时也很久。如此做下去,恐怕几年也译不完,后来只好译而少证。

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译写方法,除引用多桑原文外,皆用新法。因为多桑书之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太累赘,并可发生误会。比方谷儿只王 Lascha,《蒙兀儿史记·西域传》误读作辣思伽,其实应作刺沙(承袭此人王位的鲁速丹,就是刺沙之妹,然而新修的《元史》迄未认清是何人,《蒙兀儿史记》误作刺沙之甥女,《新元史》误作刺沙之弟妇,大约是习于中国观念,以为只有弟媳妇摄政,那有姑奶奶当权,是不特不明西史,而且并 Howorth《蒙古史》的世系表亦未寓目)。若是用新法写作 Laša,就不致于发生这类的误读了。我译多桑书常想将他的译名修改。可是他的写法无一定标准,有